

“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在京召开

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应邀作学术报告

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最重大的两个问题。近年，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及与此相关的发展理论引起了国家决策部门和社会的普遍关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各界学者陆续开展了发展理论及各国发展进程、发展战略等问题的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都有这方面的课题被列入国家重点课题，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分别和综合研究。

1987年5月14日至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在京召开。各学科与此有关课题的研究人员及对发展理论有专门研究的中、日学者和新闻、出版单位的记者、编辑近40人出席了会议。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第一天由国内各有关学科的学者交流有关发展理论研究的状况，第二天，中、日学者进行发展理论，特别是中日发展比较研究的学术交流。

第一天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课题组负责人张琢介绍了这一课题及其子课题“中日发展比较研究”的课题计划和进展情况，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介绍了历史、经济等学科有关现代化理论的重点课题，特别是他自己负责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比较研究”的课题设计及进展情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介绍了“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进展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朱庆芳介绍了“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的课题和由她自己设计的一套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初步方案，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岳颂东介绍了“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模式研究”的研究情况；南开大学张向东、彭华民介绍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从事发展理论的科研和数学的情况，中宣部理论局陶驷介绍了国外有关发展理论著作的观点和翻译情况。这是第一次跨学科的关于发展理论的信息交流和研讨会。与会者一致反映良好，希望以后能更多地开展这种交流和研究协作。

这次研讨会的第二阶段首先请日本关心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东京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富永健一作了题为“马克思·韦伯与亚洲的现代化”的专题报告，并回答了中方学者提出的一些问题。

他在报告中，介绍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对中国的研究。韦伯将世界宗教分为：基督教新派、印度教、道教和儒学。他认为儒学本身的伦理能够作为人的行为的社会驱动力，因而可以和世界几大宗教相并立。通过对儒教的研究，可以广泛地涉及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韦伯有一个有名的观点，即：西方人创造的，而仅仅在西方获得成功的是资本主义文化。可以将西方文化归为四大项目：科学技术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社会文化的现代化。亚洲人必须承认前三项是西方人创造，并通过传播方式传到亚洲的。但是在社会文化方面则不然。亚洲人大部分不信基督教，不等于不能搞现代化。在社会文化领域，宗教也不是唯一的因素。根据韦伯的思想，富永概括出五个要点：

(一) 权威结构；(二) 广义的宗族结构；(三) 城市的同行业者行会；(四) 统治阶级的性质；(五) 宗教。

根据这五个要点，富永将西方与亚洲，进一步又将日本与中国作了比较。他沿用韦伯的概念，认为中国周朝是“封建制”(feudalism)，而秦汉后，从封建制退回“家产制”(patrimonialism，又译作“世袭制”——编者)。日本大化革新时，从唐接受了律令制度，但家产制却没有在日本成为现实。到了镰仓时代，日本进入封建时期。从国家形态讲，可以说日本是介于中、西之间，而与西方的相似点更多些。

在宗教方面，与西方不同，中、日在近代前都有家族存在。但日本的同族关系并不那么密切，它不禁止族外婚，也没有族产、族谱、族规及祠堂等。

在行会方面，中国和日本均不同于西方，其行会与城市自治无关，因此不可能期望行会反对封建，中日的行会在促进现代化方面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

在统治方面，韦伯认为，“士大夫”阶层是中国独特的现象，是家产制国家以知识阶级治理天下的统治方法。而且士大夫不仅是皇帝的仆从，也有希望成为地主。而日本在中世纪是武士统治，而武士与土地所有权是分离的，普遍比较贫困。

富永教授最后谈到儒学问题。与世界上各宗教比较，中国的儒教是肯定现实，巧妙地适应现实的学说，而且把亲子关系，亲族关系及其皇帝与家臣关系都包罗了进去。日本德川时期，儒学传入日本，称为“汉学”。当时德川幕府是想以儒学维系以幕府为首的封建制度。很有趣的是，当时受到儒学教育的下级武士，后来成为倒幕运动的主要力量，而儒学经过德川末期思想家的发展，成为了反对封建的思想武器。

中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同处一文化体系的近邻——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吸引了不少中国的研究者。这次富永健一着重谈了现代化中的社会文化问题，引起在座人的很大兴趣。讨论的重点自然地转向日本的本土文化是如何接受和吸收外来文化——近代前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后来是西方文化的问题上。

比如，中国的儒家学说在日本的民族性形成过程起了哪些作用？中国的儒学与传入日本后的儒学在内容和含义上是否一致？富永认为，儒家学说的传入，在日本人的世界观中当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儒教肯定现世，适应现实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又认为，日本的传统和儒教的精神是分离的。中国的儒教建立在血缘性很强的基础上，而日本不如说是“地缘性”的。

对此，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专攻宋明理学的日本留学生市来津田彦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将宋明理学与江户时代的儒学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并不相同。中国的儒学范围主要是仁、义、礼、智、信、科举和宗法，而传入日本，儒生变成武士，礼和宗法则被切掉，在日本人思想上没多少影响。日本接受的只是儒学在精神方面的成分。比如“孝”，在中国有宗法意义，而到日本只是情感方面的。又如对“忠”字的理解，日本君臣之间没有礼义的关系，只有绝对服从，看待君臣关系要比父子关系要重。而且在江户时代，血缘关系很重的“家”也主要讲排列——即将家庭的机能继续下去的意思。

由此可见，尽管语言相似，但中、日的儒学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只有放在各自的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中才能理解它们的概念。对于西方文化也是如此。富永认为，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吸收大量外来文化的传统，至于是否留下的就是好的，要具体分析。但是日本并没有全部接受西方文化这样的过程，从现代经济、政治到技术都是这样。就是各层人中也不尽相同。明

治以后的近代化对农村不利，农村就对城市反感。只是到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农村开始变化，反现代化的人才少了。

会上，中、日学者还就现代化中“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富永教授谈到，日本能够比较平等的最初起源在于二次大战后的改革。所以，开放不一定带来新的不平等，这可以从日本的改革中得到启示，造成类似日本战后那样的条件，以避免新的不平等。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从“前现代化”（封建社会）过渡到现代化，需要有一段积累。而在积累过程中，必然造成差距的拉大。资本主义工业化就造成了这种情况。缩小必然先经过一段分化后才能实现。日本在现代化的前期阶段不但国内的差距拉大，而且积累也在剥削了亚洲各国，主要是中国。因此，他认为日本这方面的经验对中国还不能适用。中国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产生了一个矛盾，即现在加大的差距与设想的后来收入差距的缩小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问题，资本主义并没有遇到。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中心的岳颂东也认为，从他们调查了解的情况，当前中国的改革现状，公平分配问题还不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关键在于发挥企业的积极性，确实解决多劳多得。

在会上中方张琢等学者回答了日方富永健一等学者就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过程中儒学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改革者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所提的问题，具体分析了客人问及的康有为的思想变迁和不同时期的历史作用，孙中山的思想的来源，他对儒家思想的态度等问题。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毛丹青、日本东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田茂人等学者。讨论会形式活泼，答问中肯，与会各方都感到很有收获，会后和休息期间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谭 深）

（上接第121页）

此外，美国社会学家在对灾难作政策性研究时，往往受行政的支配，行政有权决定承担研究项目的学科，决定优先研究的课题及研究方法。各学科研究人员难以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本文主要参考材料：

1. 夸伦特利、R.R.戴恩斯：《对社会危机与灾难的反应》，美国社会学年度评论，1977；
2. G.A.克雷普斯：《社会学探索与灾难研究》，美国社会学年度评论，1984；
3. R.R.戴恩斯：《灾难中的组织性行为》，俄亥俄大学灾难研究中心出版，1974；
4. T.E.德雷贝克：《灾难对家庭职能的长期影响》，丹佛大学出版社，1973。
5. C.E.弗里兹：《灾难》，戴R.默顿编辑的《社会问题》一书，纽约哈尔考特·布鲁斯与世界出版社，1961年。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严立贤